

從句長與句中成份觀察譯者語言選擇模式 ——基於中日雙向平行語料庫之描述性研究

鄧敏君

本研究採取語料庫語言學的質性以及量化的研究手法，建置雙向、對比、特定文類的中日日中平行語料庫，描述翻譯文本與非翻譯文本在句子與句中成份的使用特徵，並探討中文與日文在語言使用習慣不同的情況下，譯者的語言選擇的傾向，藉此推演出翻譯行為的選擇模式。由語料分析結果得知，譯者傾向在不違背目標語的語言使用習慣之下，接受、沿用源文的語言表現，不會選擇複雜而特殊的語言表現，譯者所採取的策略因而累積、堆砌出翻譯文本的特徵，使得翻譯文本與非翻譯文本在語言使用上呈現不同的篇章構成的特徵。本研究透過分析結果建構出一套翻譯行為特質的理論解釋，希望在中日翻譯實踐以及翻譯教育的應用方面，提供審視譯文、檢討翻譯策略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描述性翻譯研究、中日語言對照、語料庫為本之翻譯研究

收件：2010 年 9 月 1 日；修改：2011 年 1 月 18 日；接受：2011 年 1 月 23 日

Exploring Translation Behavior Regarding Sentence Length and Sentence Constituents: A Descriptive Study Based on Chinese-Japanese Bi-directional Parallel Corpus

Min-chun Teng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features of translated text and non-translated texts through analyzing the sentence length and constituent format in Chinese to Japanese and Japanese to Chinese translation. It uses a corpus-based methodology and sets up a model to describe translators' linguistic choice patterns. The small-scaled bi-directional, comparable and parallel corpus is constructed to facilitate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usage of SL and TL.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ranslators tend to avoid complex and unique linguistic features in SL and TL and tend to accept features of source texts with the condition that the rules of TL will not be violated. This paper intends not only to contribute to th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of specific features of translation, but also offer insight into translation pedagogy and practices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Keywords: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Chinese and Japanese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CTS)

Received: September 1, 2010; Revised: January 18, 2011; Accepted: January 23, 2011

壹、前言

著眼於源文 (source text, ST) 與譯文 (target text, TT) 關係的翻譯研究觀點，至少有以下兩種¹，一為規範性 (prescriptive) 觀點，一為描述性 (descriptive) 觀點，前者討論如何翻譯或是譯文評析，如「何謂佳譯」、「如何保持源文與譯文意義與形式的對等」，或是「直譯與意譯」等問題，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透過研究者內省的方式來探討 ST 與 TT 的關係；後者描述翻譯行為或文本的特質，而不去評價孰好孰壞。本文希望採用後者的描述性觀點，梳理翻譯文本的特徵以及譯著的語言使用模式，進一步解釋譯者的行為，並且條理化翻譯行為的潛規則。

描述性觀點的代表性理論為 Toury(1995) 所提出的描述性翻譯研究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Toury 認為，翻譯行為並非隨機或任意的發生，譯者的行為受到翻譯規範 (norms) 所支配，而透過描述翻譯文本的特徵有助於釐清支配翻譯行為的規範。Baker(1993) 承接了 Toury 的描述性觀點，建議採用語料庫的研究方法，釐清翻譯文本的特質 (“the elucidation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ed text as a mediated communication event”) (p. 243)，她提出「顯化」(explicitation)、「簡化」(simplification)、「典型化」(normalization) 等「翻譯普遍通則」(translation universals) 的假設 (ibid.; Baker, 1996, p. 180)，開啟了語料庫為本的翻譯研究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y, CTS) 的方向，藉由語料庫所提供的語言使用的證據，闡明翻譯文本的特徵與翻譯行為的本質。

Baker 亦主張翻譯的普遍通則獨立存在於翻譯操作的過程當中，不受來源語 (source language, SL) 與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 TL) 的語言類型的影響與束縛，因此是所有的語言組合的翻譯都可以看到的現象。許多研究也多與同種語言的非翻譯文本的對比，來檢證翻譯文本的特徵 (詳見下節說明)。對此，有人批評這樣的研究方法不夠重視源語與譯語之間

語言特徵的探討，誇大或過度解釋了翻譯文本的特徵（House, 2008）。其實，Teich(2003) 為了探討 SL 與 TL 的語言系統差異對譯文的影響而建構雙向平行語料庫，對比同種語言的非翻譯文本以及不同語言的源語文本，並且觀察到翻譯行為中「源語滲透」（SL shine through）與「譯語特徵典型化」（TL normalization）的現象。因此，利用語料庫方法探討翻譯文本特徵時，不僅應有同種語言的非譯文對比觀點，也應該有 SL 與 TL 在語言系統上的差異的觀點，雙管齊下地深入剖析。

本研究將以中日、日中的翻譯文本以及非翻譯文本作為分析對象，利用語料庫語言學的方法，針對中文與日文的使用習慣不同的情況，特別是中日語篇構成的特徵——句子以及句內成份——加以探討，分析比較中、日翻譯文本的特徵以及譯者的行為規律，希望藉由本研究的分析，釐清這些特徵出現的前提條件，印證 Teich(2003) 所提出的翻譯行為模式的觀點。

本文共分為六節，除了第壹節的前言之外，第貳節綜述相關之前人文獻並闡述本研究焦點，第參節介紹本文所使用的語料庫，第肆節、第伍節探討句子和句內成份在語料庫之使用分布及選擇傾向，第陸節則分析探討本文的研究成果並闡明翻譯行為的模式，第柒節概述本研究成果、研究限制與未來的課題。

貳、文獻探討

一、以語料庫為本的翻譯研究（CTS）

描述性翻譯研究學的提倡者 Toury 認為，翻譯行為並非隨機或任意的發生，翻譯規範支配著譯者的行為。描述性研究的目的，即在於釐清 ST 轉碼至 TT 時的共通規律或法則。然而，檢證翻譯行為中的傾向或規律，需要有客觀的量化證據來支撐，由於早期對統計的研究手法與工具瞭解不多，描述性研究進展並不容易。Toury 曾由於人工分析程序繁雜，而大

嘆人的力量實在有限 (Baker, 1993, p. 241)。其後, Baker 承接了 Toury 的描述性翻譯研究的觀點, 具體提案運用語料庫的研究手法來檢證翻譯文本所存在的共同特性, 提出顯化、簡化、典型化等翻譯的普遍通則的假設 (1993, p. 243), 她更主張翻譯的普遍通則獨立存在於翻譯操作的過程當中, 不受來源語與目標語的語言類型的影響與束縛, 因此是所有的語言組合的翻譯都可以看到的現象。至此之後, 應用語料庫的翻譯研究發展蓬勃, 許多研究者投入了檢驗翻譯普遍通則的研究, 近來也有不少針對翻譯的普遍通則或是應用語料庫語言學的學會相繼舉辦², 相關研究成果豐碩。有的研究成果支持了 Baker 的假說, 例如, 與非翻譯文本的英語語料庫相比, 翻譯文本的英語語料庫在功能詞以及高使用頻率的語詞的使用頻率明顯較高, 由此證實翻譯文本中簡化的特徵 (Laviosa, 1997, 1998); 相較於非翻譯文本的德文語料庫, 翻譯而來的德文文本偏向使用典型的詞語搭配 (collocation), 使得翻譯文本傾向於典型化 (Kenny, 2000); 挪威語的翻譯文本中, 保持篇章連貫性的詞語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cohesion markers) 明顯多於非翻譯文本, 因此有顯化傾向 (Øverås, 1998); 這些研究證實了「不同的語言的翻譯文本存在普遍通則」的假說。

然而, 也有人提出反證, 如 Puurtinen(2003) 研究芬蘭語的不定子句, 發現翻譯文本較非翻譯文本更常使用結構複雜的結構, 其結果抵觸 Baker(1993) 的簡化假說³。此外, 也有人批判貝克的假說及其研究方法, Chesterman(2004a) 質疑, 不同的研究者對翻譯的普遍通則, 或是顯化、簡化、典型化等用詞有著不同的定義, 因此普遍通則的檢驗基準並不一致。在特定的環境或前提之下重複出現的行為或操作方式, 並不同於 Baker 所指的翻譯的普遍通則, 因為 “a (mere) tendency is actually somewhat less than truly universal” (Chesterman, 2004b, p. 221)。另外, House(2008) 不認同「翻譯的普遍特徵是跨越語言界限」的想法, 而訴諸研究方法的重新思考, 她認為若不重視源語與譯語之間語言特徵的探討, 則翻譯文本的特徵的探討可能只是誇大其辭、過度條理化 (overgeneralization) 的結果。

另外，也有人批評語料庫手法的翻譯研究集中在詞語分析，過於粗淺，應該要採納句子、篇章結構的觀點，深入探討翻譯文本的篇章構成特徵 (Teich, 2003)。這些批評其實讓後來的研究對翻譯文本特徵的探索手法更加細緻，也對翻譯文本的條件要求更加嚴謹，不僅有助於提升研究成果的信度與效度，也為 CTS 開啟了更多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語言系統特徵與語料庫翻譯研究

SL 與 TL 本身的語言系統特徵與翻譯文本的特徵的關連，Teich(2003) 曾根據英語與德語的科技論文的翻譯文本與非翻譯文本的調查，歸納出下列關係：

“Where the target language has more options in a particular grammatical system, it can afford to let the source language shine through. Where the target language has fewer options in a particular grammatical system, it has to compensate; where the same compensatory means is used frequently, we encounter TL normalization” (Teich, 2003, p. 219).

也就是說，翻譯文本中的「源語透過」或是「譯語特徵典型化」的特徵，與兩個語言之間的特定文法系統的選擇項目的多寡有著極大的關係。如果 TL 的某個文法系統的選擇項目多於 SL，ST 的某個語言表現方法可以反應在 TL 上，因而給予 TT 的影響就會較大，反之，要是 TL 的某個文法系統的選擇項目少於 SL，則 ST 中某個語言表現方法由於無法照應到 TL 中，TT 就會使用較多 TL 中典型的表現方法。舉 Teich(2003) 中的例子來說明，德語的詞序排列較英語自由（亦即德語的詞序選擇較多，英語選擇少），因此英譯德的文本中，theme（主位）受到英語源文較大的影響，然而在德譯英的文本中，theme 的使用多因循源語英語的使用方法。

Teich(2003) 研究結果說明，有部分翻譯文本的特徵起因於 SL 與 TL 語言系統的差異，因此唯有深入檢討、觀察語言系統差異，才能深刻探討翻譯文本的特徵、解釋翻譯行為的模式⁴。

三、中日語言特徵：句子與句中成份的規範性觀點

中日兩種語言的使用習慣，在句子的長度以及句中成分的形式似乎存在著明顯差異。我們經常可以在中日或日中的翻譯教科書中看到類似的看法，比方說，遠藤、武吉（1990）提到，一般而言，中文的「句讀節」（標點符號之間的句段長度）短，而日語的「句讀節」長，其理由在於日文習慣名詞前帶有長長的修飾定語，而中文中則不喜好名詞加上太長的定語。另外，「漢語的特點之一是使用短句表達。（中略）日語與漢語恰好相反，長句使用的比較多」（陸松齡，1995，頁 178-184）。陸松齡建議譯者在日翻中時所應該採取的策略是，盡量把長句裁切為短一點的句子，或是將日文的修飾定語拆解掉等手法。陸在這裡所指的句子的長短，應該是一個主述單位所構成的語法句子，而不是指句點到句點之間的形式上的定義。類似的觀點也見諸蘇琦（1993）與齊藤（1985）。

中日或日中翻譯的教材上都提示了中日語言的特徵與差異，這些皆屬於規範的觀點，也就是從該如何處理、該怎麼翻譯的觀點。本研究希望從描述性翻譯研究的觀點出發，透過釐清中譯日以及日譯中的文本特徵、譯者處理句子長度與句內成份的模式等問題。

四、研究焦點

本研究希望藉由驗證語料庫中語言使用的特徵，以及觀察中譯日或日譯中的翻譯行為以及翻譯文本，來探討語言與翻譯文本特徵的關連，一併檢驗 Teich(2003) 的發現是否也存在於中日或日中的翻譯文本當中。因此，本文將透過語料庫的分析檢討，探討以下議題：

- （一）中文以及日文的句子與句內成份的特徵，
- （二）中譯日以及日譯中的翻譯文本特徵，
- （三）譯者的行為模式，
- （四）語言使用習慣與翻譯文本特徵之關連。

本文中所提及的翻譯行為的傾向與規律，指的是有條件，也就是在某個特定的環境或前提之下重複出現的行為或操作方式。另外，我們將不只關注翻譯文本中語言使用的特徵，更會去重視怎麼樣的背景或條件之下容易造成這些的現象或規律。Toury(2004, p. 15) 提議要將觀察對象的語料控制在同樣條件下，細分出何種條件下會產生何種翻譯行為的規律。因此，本研究希望比較日中、中日二個翻譯方向、4 種類型的語料庫，來觀察不同翻譯方向所發生之翻譯行為的相同以及不同點，確認該特徵的產生是否來自語言本身的使用習慣，或是譯者的特定選擇傾向。另外，本研究所關心的翻譯文本與非翻譯文本的差異，是在探討哪些特定語言形式多用或是少用，而非是否違反 TL 的文法或語用規則，因為後者為不自然的表達方式，屬於翻譯調（translationese）的範疇，非本研究之焦點。

參、語料庫建置

一、文類選擇

為詳細描述翻譯文本特徵，並條理化翻譯過程中譯者的行為模式，本研究將會分析比較中文與日文的一般文本（或稱非翻譯文本），及其日文、中文翻譯文本的句子與句內成分的使用特徵。為了在共同基礎進行對比分析，本研究收集了特定文類（text-type specific）的語料——網路上觀光簡介的文章，建置成兼具對照（comparable）與平行（parallel）性質的小型語料庫。

選擇觀光簡介文章的理由主要有三。第一點，翻譯文本在兩個文化中的地位相近。Toury(1995, pp. 267-279) 的「干涉法則」（the law of interference）中曾提到，具有權威地位的語言被翻譯為較不具權威的語言時，TL 的讀者對於 SL 干涉的接納程度相對較高，所謂的 SL 干涉，指的是 TT 套用 SL 的語言表現形式或是思路邏輯，而未轉化為 TL 習慣的情況。比方

說，醫療技術先進的國家的論文翻譯至醫療技術較落後的國家時，SL 的干涉越容易發生，TL 的譯者與讀者對於這樣的干涉也較為寬容。此點提醒我們，若是該文類在兩個語言文化中地位有所傾斜，則可能造成特定方向的翻譯文本易產生 SL 干涉的特徵，影響到本研究結果。也就是說，翻譯文本特徵是受到翻譯文本在兩個文化中地位不平等的影響，而無法清楚指出與語言系統的關連性。觀光旅遊文本以及其翻譯文本在台日兩地，都是以招攬觀光旅遊人潮、提供旅遊資訊的目的，並無存在兩地不平等的問題，故為理想的語言對比的語料。第二點，考量文體風格的單純性，由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比較中日日中的語言表現特徵的差異，因此選擇的題材儘量不希望有太多因為個人書寫風格所造成的差異。觀光旅遊文本，語料間的共通性高，少有文學作品般因作者不同而有明顯差異的情況。第三點，在語料搜羅與彙整方面，觀光簡介的文章的內容與目的清楚、主題的區隔明確，在語料的蒐集與彙整上較為容易。

二、源語與譯語的語料收集

本研究的源文文本，主要取自 2004 年 8 月台灣與日本的觀光導覽官方網站，以選取臺日皆有的題材為考量。歷史方面的文本，選擇了日本北海道與沖繩等地，與台灣歷史變遷較為接近的地區的文章，地理方面，則收集了介紹兩地的島嶼、海洋、山脈、溫泉等相同題材的文章。再從長度在 300-800 詞（中文約 500-1000 字、日文約 800-1500 字）之間的文章中隨機抽取樣本。

在翻譯文本的收集上，由於網站上的翻譯文本品質參差不齊，也無法掌握譯者的背景，因此本研究採取直接付費請專業譯者翻譯的實驗手法，以確保翻譯品質保持在一定水準。將中文原文、日文原文分為 3 部分，各請 3 位譯者譯入母語，3 位譯入中文譯者的資歷為 2 年、3 年、8 年，譯入日語的譯者資歷分別為 6 年、8 年、10 年⁵，翻譯的工作時間為 2004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的 30 天。為了確保日文以及中文譯者皆在相同

的翻譯目的（skopos）與相近的條件下進行翻譯，翻譯之前告知譯者「源文文章取自官方的觀光導覽網站，將文章譯入中文／日文，目標讀者為進入觀光導覽官方網站，對台灣／日本的觀光訊息有興趣的人」，並且告知他們源文文章的出處，給予充足的資訊。

三、語料庫構成

語料庫的大小，應根據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分析的語言特徵來決定。Biber(1995, p. 131) 針對多個語言的文本做了研究分析之後指出，抽取特定語域（register）中約 10 個代表性樣本，而每個樣本 1000 詞的語料，便足以表達出該語域語言使用特徵。這裡的語言使用特徵，指的是並非特定語詞的使用情況，而是特定詞性、句型或篇章結構等的特徵。另外，運用量化分析來觀察文本篇章結構的幾篇研究論文（如 Ghaddessy & Gao, 2000; Teich, 2003）採用的語料庫規模也在 400 句到 600 句之間。因此，本研究建置了以下的中日、日中雙向平行語料庫，各個子庫（subcorpora）的內容詳見表 1。

表 1 中日、日中雙向平行語料庫

	J-ori	T-tra	T-ori	J-tra
文本數	45	45	39	39
字數	29,837	24,317	22,885	31,109
詞數／形態素數 ^註	15,944	12,550	11,915	16,776

註：中文的詞語是以 CKIP、日文形態素是以 ChanSen 2000 的結果為準。詳參下節說明。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1 的 4 個子庫，分別是日文源文（Japanese Original，簡稱 J-ori）及其中文譯文（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簡稱 T-tra）、中文源文（Traditional Chinese Original，簡稱 T-ori）及其日文譯文（Japanese

Translation，簡稱 J-tra)。其中，源文兼具著雙重角色，日文源文為中文譯文的起源文本（source text），對照於日文譯文則是非翻譯文本（non-translation），中文源文為日文譯文的起源文本，對照於中文譯文則是非翻譯文本。另外，語料庫僅收錄文章的內容，文章的標題、副標題均不納入分析當中。

肆、句子與句段分析⁶

本節以訊息傳遞的基本單位「句子」以及「句段」為觀察標的，觀察 4 個子庫的句子以及句段的數目、長度等使用特徵。本文以書寫形式作為句子與句段的區分標準，「句子」的定義為“。”、“！”、“？”、“；”等 4 種標點符號間包含的字詞與標點符號。由於中文的“，”以及日文的“、”亦為文章中標示訊息單位中的暫停記號，因此亦有納入分析之必要。本研究將以上標點符號（“。”、“！”、“？”、“；”）以及中文的“，”和日文的“、”之間的字詞稱之為「句段」。

一、中文與日文的句子使用特徵與主題發展

首先，先來看看句法研究以及計算機語言學在中文以及日文中，關於句子使用的描述與研究。Chen(1994) 分析大型語料庫後發現，中文句子約有 75% 包含了由逗點或分號、句號等標點所切割出的「句段」(sentence segments)⁷，也就是說，僅有兩成五的句子從開始到最後一鼓作氣，在句點與句點之間完全沒有休息，而有七成五的句子都在中間暫停。另外，我們可從 Chen(1994, p. 282) 的調查結果看到，英文的句點與逗點的使用頻率幾近相當，然而中文的逗點使用竟是句點的 4 倍之多，這一點可謂中文的特殊之處。Tsao(1990, p. xi) 也指出，一般而言中文的文章當中，使用逗點的傾向多於使用句點，然而斷句習慣卻因人而異。他指出中文句子為「主題連鎖」(topic chain) 的單位，針對同一主題的敘述內容，通常都會

在同一個句子裡 (Tsao, 1990, p. 63)。例句 (1) 取自語料庫的 T-ori 子庫，是介紹「澎湖」地理特色的長句，是由 10 個句段所組成。

- (1) ①澎湖是台灣第一大島，②位處中國大陸與台灣海峽之間，③有64座大小島嶼，④300多公里的海岸線，⑤一年四季呈現不同的風情與景觀，⑥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與歷史人文，⑦主要的島嶼地景包括玄武岩方山、海岸珊瑚礁、蝕礁、沙灘、漁村文化與候鳥棲地，⑧尤其玄武岩方山構成澎湖獨特的地理景觀，⑨也因冷流與黑潮的交會，⑩造就漁產豐富的海洋牧場。

綜上說明可知，中文的句子，功能上較接近主題切分的單位。這並不意味著中文的同一主題的內容就一定是包含在同一句子當中，而是說，中文出現長句時，通常是對於該主題的描述很長。

日文的述語通常出現在句子最後，而且書面語的句中停頓與句尾結束的語言形式明顯不同，句中停頓多以中止形來銜接，句尾則以述語的終止形來結束⁸。整體而言，比起中文來，日文句子結束會明顯地表現在語言形式上。如果按照 (1) 的斷句方式譯為日文的話，會得出如 (2) 的句子。

- (2) ①澎湖は台湾最大の島であり、②中国大陆と台湾海峡の間に位置しており、③64の大小の島々と300kmの海岸線を有しており、④一年の四季は異なる風情と景観を呈しており、⑤豊かな自然生態と 史人文を有しており、⑥主な観光スポットには玄武岩の方山、海岸の珊瑚礁、海蝕が進んだ岩浜、砂浜、漁村文化、渡り鳥の滞在地などがあり、⑦特に玄武岩の方山は澎湖の独特な地理的景観を構成し、⑧寒流と黒潮の合流により、豊かな海洋牧場を形成している。

這樣包含多個中止形的句子，雖不違反日文的文法規則，但卻不太自

然。本研究針對例句（1）與（2）做了簡單的母語者意見調查，請 5 位日語母語者在閱讀例句（2）後修改當中不自然的部分。在沒有任何提示請他們修改句點的情況下，5 個人皆將句段末的動詞作適度調整，並將句中的“、”改成“。”。其中，有 2 人將之拆成 4 句，2 人拆為 3 句，1 人拆成 2 句。因此可知，日語母語者並不認為這樣的長句使用是自然的。同樣的，針對例句（1），請 5 位中文母語者修改當中不自然的部分，並沒有人將當中的逗號改成句點。這證明了中文對於長句的使用沒有嚴格的限制。

另外，與日文不同，中文不發生形態變化，因而在句段的結束與句子的結束之時，語言形式並沒有任何差異，這使得長句的存在不會有不自然的印象。其實就算在將（1）切割成兩、三個句子也同樣沒有不自然的感覺，由於中文對於句點的使用方式彈性頗高，因此相同主題的內容也可以用句點隔成不同句子。

再者，日文有一個主題助詞「は (Wa)」。「は (Wa)」有所謂「跨越句點」的特徵⁹，亦即，一個談話主題可影響的範疇，不僅止於該句，更可以擴及後面的句子，也就是說，數個句子可共用前面句子出現的主題¹⁰。因此，日文句子的功能，並不一定像中文句子一樣，是包含主題的單位。

瞭解中文以及日文的句子與句段的定義、句長代表的功能意義之後，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觀察語料庫中句子與句段使用分布的特徵。

二、語料庫調查結果

表 2 為 4 個子庫的句子長度。在此，中文句長指的是以上標點符號之間的詞數，日文句長是型態素的數目。中文的詞語的定義是以中研院所開發的 CKIP¹¹ 所斷出的詞項為單位，而日文是以 ChaSen¹² 所斷出的型態素為單位。由於中日兩種語言的類型不同（中文為孤立語，日文為膠著語），再加上使用的分詞斷句的分割基準也不同，因此表 2 的中日兩種語言間的句長，並不能直接拿來互相比較。為了有一個可以比較的基準，我們把中日間的詞語總數與型態素總數的比值 1.33 拿來作基準¹³，將中文的實際數

值乘以 1.33，以方便進行兩個語言間的對比。

首先，我們將 4 個子庫的平均句長及其標準偏差揭示如表 2。表下方的「換算數值」則是將 T-tra 與 T-ori 的實際數值乘上 1.33 的結果。表中句數即為“。”、“！”、“？”、“；”等句末標點符號的數目。

表 2 4 個子庫的平均句子長度

		J-ori	T-tra	T-ori	J-tra
實際數值	N (句數)	619	587	401	608
	$\bar{X}$ (平均句長)	25.76	21.37	29.72	27.60
	SD (標準偏差)	13.47	10.18	18.81	13.08
換算數值	$\bar{X}'$ (新平均句長)		28.42	39.53	
	SD' (新標準偏差)		13.53	25.1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表 2 可知，這 4 個子庫的字詞總數接近，但構成句數卻有所不同。T-ori 翻譯至日文 J-tra 後，句子增加了 1.52 倍，而 J-ori 翻譯至中文 T-tra 後句子減少 5.2%。因此，我們可以說，中譯日時，日文譯者並不以源文（中文）的斷句方式為依歸，而傾向把句子切短，而日譯中時，句數改變不多，所以中文譯者極可能多遵照日文原有的方式來斷句。

比較相同語言文本的實際數值，T-ori 較 T-tra 的平均句長要來的長¹⁴，而 J-tra 較 J-ori 來的長¹⁵。比較源文以及譯文的長度（日文使用實際數值，中文使用換算數值），我們發現 T-tra 長於 J-ori，而 J-tra 又比 T-ori 來的短，兩個翻譯文本完全呈現出相反的結果。簡單來說，4 個子庫當中，平均句長以 J-ori 最短，而 T-ori 最長，翻譯子庫的平均句長在兩個源語（或可稱為非翻譯文本）子庫的平均句長之間。

為了瞭解 4 個子庫的句長分布情況，我們以 5 個詞做為一個區段，50 詞以上的超長句歸類為一個區段，將每個區段的句長分布佔總句數的比

例作成圖 1。由於 4 個子庫的句數不等，因此以句長佔整體的百分比方式來呈現。圖 1 的中文的詞數（句長）是以上述換算過後的詞數來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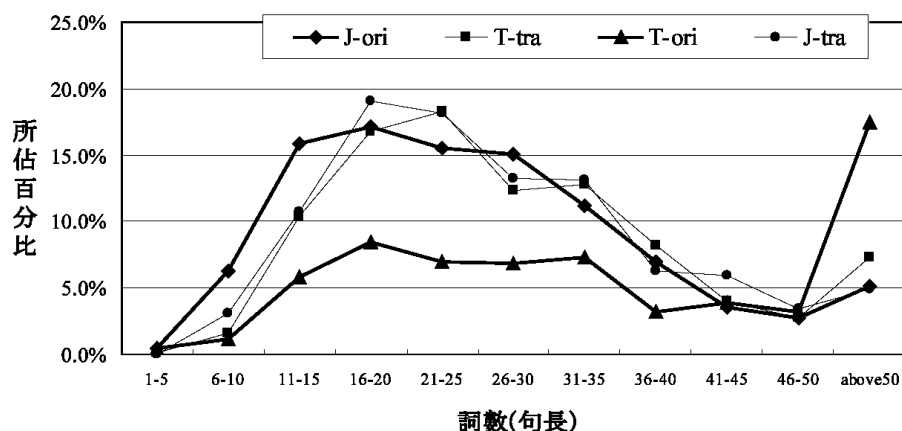


圖 1 4 個子庫的句長分布比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觀察圖 1 可知，J-ori 在 15 個詞以下較短句子的使用較多。16 ~ 40 個詞之間中等長度的句子，在 J-ori、J-tra、T-tra 中的使用比例上雖互有高低但差異不大，然而 T-ori 則是明顯的少用。到了 50 詞以上的較長的句子時，T-ori 共有 108 句，佔 T-ori 總句數的 26.9%，比例相當高，而 J-ori 只有 32 句，佔 J-ori 總句數的 5.2%，而 J-tra 有 30 句，佔 4.9%，T-tra 有 45 句，佔 7.7%。由此可知，表 2 中 T-ori 的標準偏差為什麼會如此之大，主要是因為 T-ori 有著許多長句的緣故。

表 3 為 4 個子庫的句段長度。要特別注意的是，日文中不論表示名詞並列或是句中的暫停標識，一律使用逗點“、”的符號。比起中文的“，”使用範圍顯然是要廣的多，日文句段的定義也比中文的句段來的寬泛¹⁶，因此無法直接比較源文與譯文的句段數目¹⁷。在此，我們僅分別就中文及日文的翻譯文本與非翻譯文本的句段長度來檢討。

表 3 4 個子庫的平均句段長度

	T-ori	T-tra	J-ori	J-tra
N (句段數)	1,631	1,595	1,754	1,857
$\bar{X}$ (平均句段長)	7.22	7.60	8.85	8.89
SD (標準偏差)	3.95	3.98	5.62	5.5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2 的句子數目上，T-ori 遠比 T-tra 少的多，而在表 3 中，T-ori 與 T-tra 的平均句段長與標準偏差相差不大，但 T-ori 還比 T-tra 的句段數要多一些，可見 T-ori 中的句子裡由許多逗號隔開，實際上長句是由許多較短的句段所組成。日文方面，雖然表 2 的句子數目上 J-ori 與 J-tra 相差不多，但是表 3 的句段數目上，J-tra 的句段數多於 J-ori，而平均句段長與標準偏差相差不大。

整體而言，在句段的使用上，不管日文或是中文，翻譯文本與非翻譯文本的語料庫之間，都沒有如句子調查結果那般差異顯著。不過，表 3 倒是清楚的說明了中文的長句是句點與句點的距離很長，當中有許多逗點加以區隔，使得閱讀不那麼困難。

三、分析與考察

我們看到 2 個翻譯文本中句子的使用，不論在句數、句長上都比較接近日文的非翻譯文本。日譯中時，中文譯者多按照源文的斷句方式來翻譯，而中譯日時，日文譯者並不以源文的斷句方式為依歸，中文源文的長句被切分成更多句子，以符合日文本身的書寫習慣。再從句長的使用分布來看，中文與日文的翻譯文本皆少用太長或太短的句子，而多使用中間長度的句長。翻譯文本的句子似乎不喜好極端，因此他們的句長使用分布便夾在中、日源文（非翻譯文本）之間。

中文的句子，在主題發展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中文長句產生的背景是，同一個主題的相關內容多，放在同一個句子裡的可能性也就高。然而譯者在翻譯時思考方式並不相同，他們在句子的區分方法多參照原文，因此處理方式與一般寫作時的處理方式不同。當然有一點非常重要，中文對句長的限制並不嚴格，因此中文譯者按照原文去切分句子長度並沒有困難。

另一方面，日文的句子單位與主題發展沒有直接相關，同樣一個主題內容，如果內容過多，便可以打上句號，另外再起一個新句子。本研究中，日文譯者面對中文源文時，並沒有受到中文句點使用方法的影響，因為要是使用太多句中的中止形來維持原文的句長的話，反而讓日文顯得不自然。因此，日文譯者傾向按照日文本來的語言習慣來構成句子。

彙整本節的分析考察，我們可以說，當譯者在面對原文的句子單位時，如果不造成違反譯語的語言使用習慣的話，就會盡量去維持原文的形式。如果有違反譯語使用習慣，或是維持原文形式有困難的時候，譯者便會改變原文的形式，選擇符合譯語的使用習慣的表現方法。這一過程看似理所當然，但是搭配上中文以及日文在句子使用習慣的不同——中文在句子長度的使用上無嚴格的限制，而日文則不偏好中止形太多的句子，則中文譯文的句長特徵便是，極其貼近日文源文，而日文譯文的句長特徵也較類似日文的特性。

這裡所觀察到的譯者行為模式，可以作為譯者翻譯時的借鏡。若是翻譯的目的在於達成貼近目標語的使用習慣的文本的話，則中翻日的譯者在句長的使用，只要按照日文的使用習慣即可，不用特別花費心力去調整自己的翻譯模式；然而日譯中時則譯者要注意不要受到源文影響，多使用逗號區隔成句段，並在同一個主題的內容結束時再劃下句點等終結句子的符號。

伍、句中成份分析：以連繫句為例

由於不同的述語動詞就會有不同的使用習慣，因此本節僅以特定句型，即連繫句（copular sentence）的句中成分為觀察對象，分析 4 個子庫中，連繫句的主語成份及補語成份的使用特徵及差異所在。

連繫句是中、日文皆有的基本句型，使用頻率高¹⁸，且構成成份單純，僅包含述語、主語及補語。日文的連繫句的形式為「A は (が) B だ」，由主語（即 A）、主語的助詞（は或が）、補語（B）以及判定動詞「だ」所組成，稱為「コピュラ文」、「判定文」（判定句）、「指定文」（指定句）、「判断文」（判斷句）。中文連繫句的形式為「A 是 B」，組成成分為主語（即 A）、補語（即 B），加上連繫動詞「是」。本文僅以 A 與 B 皆為名詞性質的詞組（名詞組或名詞子句）所組成的連繫句為觀察對象。

一、中文與日文的連繫句的功能與分析方法

（一）連繫句的名詞組之意義功能

一般而言，中文或是日文的連繫句主要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兩個名詞成份為成員與上位分類的「集合成員關係」，如，例句（3a）與（3b），「他」是「外科醫生」此種職業類別的構成成員。另一種，是表達 2 個名詞組所指涉的對象相同的「等同關係」。如例句（4a）或（4b）中，《紅樓夢》的著作即為曹雪芹，曹雪芹也就是《紅樓夢》的著作，兩者的指涉對象相同¹⁹。

(3) a. 他是外科醫生。

b. 彼は外科医である。

(4) a. 曹雪芹是《紅樓夢》的著作。

b. 曹雪芹は『紅樓夢』の作者である。

另外，（5a）與（5b）的句中保有連繫動詞，然而其主語部分則為「子句 + 的」，中文稱為「準分裂句」²⁰，日文則是由「形式名詞」為中心語所構成的「分裂文」²¹。從訊息焦點的角度來看，中文的「準分裂句」，

前半的主語為前提、預設，多為已知訊息，而後半則為未知訊息，是為焦點。然而日文的「分裂文」，因為有助詞「は」與「が」而使得訊息焦點的出現位置與詞序無絕對關係。「A は B だ」的 A 為前提，B 為焦點，而「A が B だ」則相反，焦點在 A 而前提在 B。

(5) a. 繼安東氏之後統治蝦夷地的，是武田信玄的後代子孫松前藩藩主松前氏。

b. 安東氏による統治の後、蝦夷地の支配者となったのは、武田信玄を始祖とする松前氏の松前藩である。

中文的「準分裂句」中，主語成份的「的」後方常可以補接上「人、東西、事情」等名詞，成為關係子句修飾中心語的結構，形成相同的句法結構，例如，前述的（5a）便可以寫成「繼安東氏之後統治蝦夷地的人／人物」²²。

另，中文的「為」可以用在連繫主語與補語，除了多用於書面語言之外，語意、文法功能與「是」的差異不大，因此本文也將「為」的句子也列入觀察對象。

（二）連繫句中成份之分類基準

為了瞭解 4 個子庫連繫句名詞組的特徵，本節以形式作為分類基準，觀察連繫句中主語名詞組與補語名詞組的內部結構，以名詞修飾成份的有無及修飾成份本身的性質作為分類的標準。

1. 單純名詞（以下簡稱 NP1）

單純的名詞所形成的名詞。如以下的（6a）、（6b）。另外，限定詞或中文的非謂形容詞，如主要、真正、新興等無述語功能的形容詞（如（7a）、（7a）），以及日語當中的「いわゆる、ある、たいした、大きな、例の」等連體詞所形成的名詞組皆歸為本類。NP1 並列所形成的聯合名詞組亦歸為 NP1。

- (6) a. 南竿島為馬祖列島之政經文教中心，…
 b. 南竿島は馬祖列島の政治、經濟、文化、教育の中心であり、…
- (7) a. 這個構造就是柱狀節理。
 b. この構造が柱狀節理である。

2. 由述語所修飾的名詞組（以下簡稱 NP2）

具有述語功能的形容詞與動詞修飾名詞所形成的偏正名詞組，如（8a）、（8b）、（9a）、（9b）。另外，若有 NP1、NP2 並列所形成的聯合名詞組則分類為 NP2。

- (8) a. 阿里山地區著名的歷史人物吳鳳便是其中之一。
 b. 阿里山地方で有名な歴史上の人物、吳鳳は先住民族と接触した一人です。
- (9) a. 位於富岡漁港北方的小野柳，是東部海岸最南端的風景據點，……
 b. 富岡漁港の北に位置する小野柳は、東部海岸の最南端のビューポイントである。

3. 子句所形成的名詞組（NP3）

日中多以形式名詞的「の、こ、か」等接續在後，日文稱為「名詞節」²³。如上述的（5a）與（5b）即為本類型。另，中文的準分裂句的訊息焦點為處所、時間、目的、情狀的時候，必須在「的」的後方補上實際的名詞，所以本研究將這類句型的主語詞組分類為 NP3 而非 NP2。

二、語料庫中的使用分布與調查結果

（一）4 個子庫的使用分布

從 4 個子庫中抽取出連繫句²⁴，再根據上節的分類方法，將其主語名詞組與補語名詞組的特徵表示如圖 2。圖 2 中的「輕 + 重」、「重 + 輕」、「同樣」是指，主語與補語成份的相對關係²⁵，「輕 + 重」是指主語較補語的形式簡單，如主語為 NP1 而補語為 NP2 或 NP3，或主語為 NP2 而補語為 NP3，「重 + 輕」則反之，「同樣」是指主語與補語形式相仿，皆為 NP1 或 NP2 或 NP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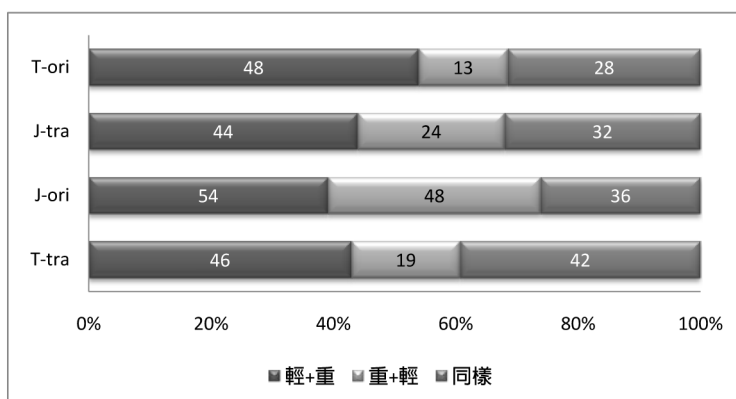


圖 2 連繫句中主語名詞組與補語名詞組的使用特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圖 2 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T-ori（非翻譯中文／中文源文）的「輕 + 重」的組合在 4 個子庫中使用最頻繁，而 J-ori（非翻譯日文／日文源文）則是「重 + 輕」的組合最多。2 個翻譯文本子庫 J-tra 與 T-tra 的「輕 + 重」與「重 + 輕」組合的使用特徵不接近他們的源文，跟同語言的非翻譯文本的特徵也不甚相同，介於 J-ori 與 T-ori 之間。單單只針對主語成份的特徵以圖 3 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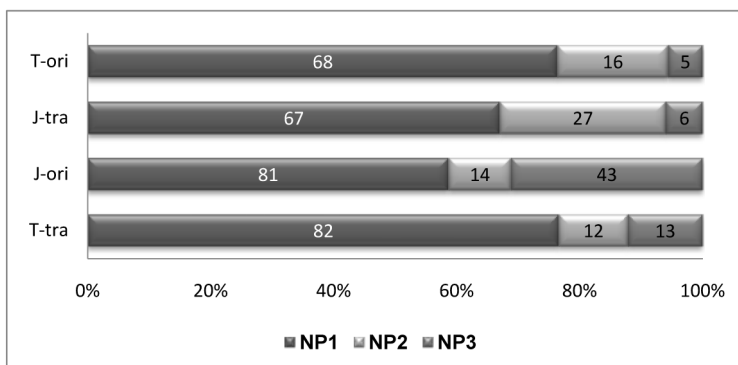


圖 3 連繫句中主語名詞成份的使用特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圖 3 中，T-ori 的連繫句傾向由單純的名詞來當主詞，J-ori 使用名詞子句的主詞最多。由此可知中文的主語名詞組偏向使用輕而簡單的成份，而日文則不排斥使用含有主述結構，重而複雜的成份來當主語。非翻譯中文偏好形式簡單的名詞來形成主詞，比方說例句（10）。相較之下，非翻譯日語則是喜歡將整體的事件以「の、こと、か」包裹，用名詞子句的方式來形成連繫句。比方說例句（11）。

（10）福爾摩沙（美麗之島），是十六世紀葡萄牙人看到台灣這片青翠
秀麗的島嶼所發出的讚嘆；<TJPC-072-ori>

（11）かつて蝦夷地と呼ばれていた北海道が日本の歴史に登場するの
は、齊明天皇時代。<JTPC-001-ori>

若要將例句（11）翻譯為中文的話，與其直譯為「從前被稱為蝦夷地的北海道首次登上日本歷史舞台的時間，是齊明天皇時代」，顯得相當的冗長，不如將他改寫成「北海道舊稱蝦夷地，首次登上日本歷史舞台的時間是在齊明天皇時代」，雖然改變了源文的「前提－焦點」的訊息呈現方式，但是這樣的譯法較為自然、易讀。中文在名詞子句的方式來形成連繫

句上並無語法上的限制，但是實際使用上，中文習慣以具體名詞來開始一個句子，發展其後的內容，較少以名詞子句來當做主詞。

圖 3 中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NP2（述語所修飾的名詞組）的比例以 J-tra 的使用最多，然而 J-ori 使用 NP2 比例並不多。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所謂的日文比中文更常使用定語修飾的情況，並不是發生在連繫句，而是其他的二元述語或三元述語的句型，當然有可能是因為本語料庫為觀光導覽的文本，主語成份使用關係子句修飾主要語的形式在本類型文本中並不顯著。這一點需透過更大型、及其他文本種類的語料庫加以檢證分析²⁶，本稿只關注翻譯行為的分析。

（二）譯文與源文的對應關係

本節將觀察翻譯文本中連繫句與源文對應關係，並進一步分析以上的翻譯文本的特質。首先，譯文與源文主語是否相同的判定標準為，譯文的連繫句與其對應的源文句子中，兩者的主語成份：（1）是否指涉同一物體或事件，（2）形式上是否同屬 NP1 或 NP2 或 NP3。若兩者皆是，則認定「譯文與源文主語相同」，若只有一點相符則列入「譯文與源文主語不相同」。比方說，下面的（12b）的「古富士火山」就是與源文（12a）的「古富士火山」指涉對象相同而形式也無差異，因此視為「譯文與源文主語相同」。而（13b）的譯文的主語名詞組「樹冰」雖與源文（13a）的主語名詞組雖指涉對象相同，但是沒有修飾成份，故形式上並不相同，列入「譯文與源文主語不相同」之列。

（12） a. 古富士火山は、現在の富士山の土台となった火山で、…

b. 古富士火山是現在富士山的前身，…

（13） a. 藏王の冬の名物「樹氷」は、木の枝に水分が凍りつき、そこ雪が取り込まれることによってできる景色である。

b. 「樹氷」是藏王冬季的奇景，樹枝上的水珠凝固成冰後，再覆蓋一層白雪。

T-tra 的分析結果呈現如表四。表 4 第 1 列為連繫句主語成份的 3 個類型。第 2 列為 T-tra 連繫句主語成份與 J-ori 對應之句子主語成份相同的比例（相同的頻率／該成份總數），括弧內為出現頻率，第 3 列為 T-tra 連繫句主語成份與 J-ori 對應之句子主語不同的比例及原因。

表 4 T-tra 與源文主語相同的比例（括弧內表出現頻率）

T-tra 連繫句 主語名詞組	與 J-ori 對應之句 子主語相同的比例	與 J-ori 對應之句子主語不相 同的比例及原因		合計
NP1	65% (53)	35% (29)	拆解 (9)、添加主語 (17)、主述顛倒 (2)、 其他 (1)	82
NP2	58% (7)	42% (5)	拆解 (3)、合併 (2)	12
NP3	77% (10)	23% (3)	合併 (2)、主述顛倒 (1)	1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表 4 的數據上可以看出，T-tra 的連繫句主語成份為較輕的 NP1 或 NP2 時，與源文主語相同的比例在 6 成左右，與源文主語不同，主要是拆解日文源文中較長、較重的成份，或添加了日文源文沒有表達出來主語²⁷。T-tra 的連繫句主語成份為較重的 NP3 時源文也為 NP3 的比例最高，其實日文源文中有許多 NP3 的成份，然而實際被保留在中文源文的比例並不高²⁸。

J-tra 的分析結果呈現在表 5。表 5 的第 2 列為 J-tra 的連繫句主語成份與 T-ori 對應之句子主語相同的比例，括弧內為出現頻率，第 3 列為 T-tra 連繫句主語成份與 J-ori 對應之句子主語不同比例及原因。

表 5 J-tra 與源文主語相同的比例（括弧內表出現頻率）

J-tra 連繫句 主語名詞組	與 T-ori 對應之句子 主語相同的比例	與 T-ori 對應之句子主語不相同的 比例及原因		合計
NP1	86% (58)	14% (9)	添加主語 (7)、拆解 (1)、主 述顛倒 (1)	67
NP2	52% (14)	48% (13)	合併 (10)、主述顛倒 (2)、其 他 (1)	27
NP3	67% (4)	33% (2)	合併 (2)	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J-tra 的連繫句主語成份為較輕的 NP1 時，與源文主語相同的比例高達 86%，由此可知，日文譯文對於源文的輕成份的接受度相當的高。其他沒有按照源文翻譯，相當多是因為源文沒有主語，而譯文以添加主語的方式來補足。連繫句主語為 NP2 及 NP3 的時候，採用與源文相同的比例明顯降低。由於中文源文中重的成份不多，因此 J-ori 的 NP2 與 NP3 中許多是合併其他成份而組成的。

三、分析與考察

由以上調查結果可知，譯文連繫句的主語名詞組與源文主語的意義或形式相同的比例頗高，整體而言，日文譯文相同的比例甚於中文譯文。也就是說，日文譯文維持中文源文主詞的比例甚高，特別是形式單純的主詞，而中文譯文則多將日文源文中較長、較重的成份加以拆解、切割成較單純的形式，而使得譯文與源文不同的比例較高。

另外，不論是中文譯文或是日文譯文都不常使用以名詞句為主語的連繫句。由 4 個子庫的使用分布的調查可知，日文似乎經常使用以名詞子句為主語的連繫句，中文雖有準分裂句，但是實際上的使用頻率並不高，這可以說是使用方法存在而實際使用卻不受青睞的例子。因此，縱使日文源文中有大量的名詞句主語的連繫句，在中文並不偏好的使用習慣下，源文

的名詞子句主語的形式多被拆解。而日文譯文，在源文的名詞子句來源不充沛，而自行產出名詞子句主語又不容易的情況下，自然其使用頻率也就不高。

綜觀以上分析考察，從成份輕重的角度來看翻譯文本的特徵的話，當源文的語言特徵得以在譯語中使用習慣上沒有衝突的時候，譯文便有維持、順應的趨向，例如，日文譯文較容易保留中文源文中的單一名詞。如果源文的語言特徵與譯語的使用習慣不同，也就是說，源文的語言特徵較難以在譯文中維持下來的時候，譯文便會改變源文的形式。比方說，因為中文傾向以具體、單純的名詞來表達，所以日文源文名詞子句的主語就很難在中文譯文中維持同樣形式。

連繫句的主語使用上，中文偏好單純名詞而不偏好使用名詞子句，限制較嚴格，而日文的主語形式選擇較多，使用習慣上限制較寬鬆，因此在中譯日或日譯中的翻譯文本中，連繫句的主語成份會接近使用習慣較為嚴格的中文源文。在這樣的操作模式下，造成了中文譯文以及日文譯文的性質趨於相近，特別是在單純名詞以及名詞子句的使用上，特別接近中文源文。

這裡所觀察到譯者行為模式在作為譯者的參考：若是翻譯的目的在於達成貼近目標語的使用習慣的文本的話，則日譯中的譯者在連繫句中成份的使用上，按照中文的使用習慣即可；然而中翻日時則譯者要注意不要受到源文影響，在遵循原文使用單純名詞的主語前稍微思考一下是否有其他表現方式。

陸、翻譯文本的特徵與翻譯行為的傾向

我們將以上兩個例子整理出「背景前提」、「翻譯過程的行為模式」、「翻譯文本的特徵」等三個部分。

(1) **背景前提**：SL 與 TL 在對某個語言表現的使用習慣不同，有一方

的語言使用習慣的限制較嚴格（也就是 Teich(2003) 說的選擇少），有一方的較寬鬆（也就是 Teich(2003) 說的選擇多）。

(2) 翻譯過程的行為模式：ST 的語言表現方式在 TL 中可以接受時便維持，有衝突時便改變。

(3) 翻譯文本的特徵：翻譯文本在該語言使用上的傾向會偏向語言習慣的限制較嚴格的一方。

SL 與 TL 在對某個語言表現的選擇習慣不同，有一方的限制較嚴格，有一方的限制較鬆散時，翻譯過程中，只要是 TL 中可以接受的表現方式，譯者較少更動源文表現的動力，如日文源文的一般長度的句子與中文源文的單純形式的主詞，而 TL 中不常用的語言形式，如中文源文的長句與日文源文的名詞子句的主詞，則難以維持。這樣的語言選擇模式，影響了翻譯文本的語言特徵，造成了翻譯文本與非翻譯文本的不同之處。使用限制較為嚴格的語言的翻譯文本，還是照著本來的使用習慣，然而使用限制較為寬鬆的語言的翻譯文本，會與同語言的非翻譯文本有所差異。因此，翻譯文本在該語言特徵的使用上，會偏向語言限制較嚴格的一方。

Teich(2003) 說到，如果 TL 的某個文法系統的選擇項目多於 SL，ST 的某個語言表現方法給予翻譯文本的影響就會較大，反之，要是 TL 的某個文法系統的選擇項目少於 SL，TT 便會使用較多 TL 典型的表現方法。其中，某個文法系統選擇項目的多寡，與本研究中某個語言使用習慣的限制是嚴格或寬鬆，有共通之處。

本研究的調查結果顯示，兩種語言使用習慣的差異確實是造成翻譯文本特徵的一個影響因素，印證了 Teich(2003) 的研究，也解釋了翻譯文本特徵的成因。在翻譯實務上的貢獻，則是提供譯者自己的翻譯行為可能存在的趨向：兩種語言在某種語言表現習慣一方寬鬆，一方嚴格時特別容易發生。這時譯者便可以適時調整翻譯策略，達成符合翻譯目的的譯文。

柒、結語

本文透過對句子與句中成份的分析，發現的譯文特徵與譯者語言使用模式如下：中文對於超長句的使用沒有特別的限制，而日文的連繫句的主語較中文更常使用名詞子句的成份，而中譯日及日譯中的翻譯文本中並不反映各自 TL 的使用特徵，較少使用超長句與以名詞子句為主語的連繫句。因此，譯者傾向不去做太繁複或太特殊的語言表現，接受源文中不違背 TL 語言習慣的使用形式，譯者所採取的策略因此累積、堆砌出翻譯文本的特徵，這項翻譯文本特徵的產生背景是，該項語言的使用習慣在 SL 與 TL 中一方寬鬆，一方嚴格的情況。

本文藉由雙向語料庫的確認，釐清了翻譯文本在句子與句中成份使用上的特徵，推演出翻譯行為的選擇模式，檢證了翻譯行為的本質。調查結果顯示，兩種語言使用習慣的差異可以說是造成翻譯文本特徵的一項影響因素。另一方面，我們藉由語料庫的對比分析，而對中日兩種語言特質有更深入的理解，在中日翻譯實踐以及翻譯教育的應用方面，希望能提供審視譯文、檢討翻譯策略的參考依據。不可諱言，由於本研究的語料庫只收納了單種文本類型以及少數譯者的語料，難以將研究結果一般化到其他類型的翻譯行為。本研究希望提供一個開端，今後還希望繼續以更多的語料為觀察對象，結合語言學的觀點深入探討語言使用習慣與翻譯文本特徵的關係。

註釋

1. 規範性與描述性的研究觀點之外，還可能有解釋性（explanatory）的研究觀點（Chesterman, 2000）。
2. 例如，2001 年 10 月於 Finland 的 Savonlinnas 召開題為 “Translation universals: Do they exist?” 的研討會，後由 Mauranen & Kujamäki 編撰成書在 2004 年出版。2010 年比利時根特大學 (University College Ghent) 舉辦了探討最新研究方法的研討會 (“Methodological advances in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中國大陸對語料庫翻譯

研究的發展也相當積極，中國上海交通大學於 2007 年與舉辦了語料庫與翻譯研究的國際研討會（“Conference and workshop on corpora and translation studies”）。2009 年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學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學外語學院、上海交通大學翻譯與辭典學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聯合舉辦「全國首屆語料庫翻譯研討會」。

3. 還有人提出了新的假說，例如 Unique-Item Hypothesis (Tirkkonen-Condit, 2002)。
4. 呼應 Teich(2003) 以上成果的研究並不多見。戴光榮 (2010) 引用 Teich(2003) 源語透過效應的概念 (SL shruning through)，從大型語料庫調查中發現英語源語中被動式的源語透過效應，造成漢語中被動句超用的情況。然而，戴的研究似乎流於翻譯文本現象的呈現，忽略討論英語與漢語系統中被動句的語言規範的特徵，以及為何這樣的現象會發生在被動句而非其他句式。
5. 這些譯員在市場上有多年的翻譯經驗，或通過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中日組之專業考試者。
6. 本節是根據鄧敏君 (2008) 的部分結果再新加入句段相關文獻與分析之外，新增母語話者調查、中日語篇構成的對比分析。
7. 根據 Chen(1994, p. 281) 引用 Yang(1981) 的分析結果，「句段」(sentence segments) 可能簡單到只有一個字，或者複雜如詞組或句子。詞組有名詞詞組 (noun phrase, NP)、動詞詞組 (verb phrase, VP)、形容詞詞組 (adjective phrase, ADJP)、副詞詞組 (adverbial phrase, ADVP) 或是 (prepositional phrase, PP)。
8. 此外，日文的疑問句以助詞「か」來結束，也可能以語氣詞「ね、よ、あ」等，助動詞「う、よう、だろう」或命令形來完結。另，所謂的「体言止め」的句子，則是省略斷定助動詞「です／である／であります」，將名詞或形容名詞放在句尾。
9. 即三上 (1960, 頁 117-129) 所說之「ピリオド越え」(跨越句點)，亦即主題的影響力跨越句點。
10. Thomson(2005) 提案日文不應以句子為 Theme-Rheme 的分析單位，而應以主題所支配的範域作為 Theme-Rheme 的分析單位，並將之稱為 Theme Unit。
11.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詞庫小組與 1994 年開發之 CKIP〈中文自動斷詞系統 1.0〉精確率為 96%，為求分詞斷句的分析結果正確，經過系統分析之後再以人工校對一遍。
12. 日本奈良先端科學技術大學大學院情報科學研究所松本研究室所開發之「茶筌」Wincha 2000R2，本版本使用之形態素詞典為 ipadic2.0。為求分詞斷句的分析結果正確，經過系統分析之後再以人工校對一遍。
13. 中文 11,915 個詞譯為日文後成為 16,776 個形態素，比例為 1.333。但是這樣的藉由比值的比較方式僅作參考之用，不適宜再進一步作統計分析。
14. T-ori 與 T-tra 的資料並不對稱，在加上 2 著的標準偏差相差極大，因此採取 Welch 法的 t 檢定的結果，其差異具有統計意義 ($t = 8.111, p < .01$)。
15. J-ori 與 J-tra 的標準偏差差異不大，而且可確認其等分散性，因此採取一般的 t 檢定。其結果為差異有統計意義 ($t = 2.428, p < .05$)。

16. 日文與中文當中，句首主題出現後也有表示逗號的習慣，這樣的逗號所區格出來的語段，本文也將之納為句段。
17. 細緻地分析句段長度的話可能需要手動分類日文的“、”的符號為並列或句中暫停，本文不擬深入分析。
18. 本研究普查子庫 T-ori 與 J-ori 的句子的第一個句段的句型後發現，連繫句是使用頻率最高的句型，各佔 20% (82/401) 與 23% (147/619)，多出其他二元以及三元述語動詞的句子許多。
19. 區分「集合成員關係」與「等同關係」的一個特徵是，「等同關係」的連繫句中，主語的前項名詞成份與補語的後項名詞成份可以互相調換位置（如 (1a) 與 (1b)），因為兩者的指涉對象是相同的。然而，表示「集合成員關係」的連繫句的主語與補語調位的話，就成了不合文法的句子了（如 (2a) 與 (2b)）。此點，中日的連繫句皆然。
 - (1) a. 《紅樓夢》的著作是曹雪芹。
b. 『紅樓夢』の作者は曹雪芹である。
 - (2) a. * 外科醫生是他。
b. * 外科医は彼である。
20. 關於中文的「準分裂句」或「分裂句」的分析可參照湯庭池（1980）。
21. 英文的分裂句（cleft sentence）是指由 “It is...that ...” 所形成的句型，如 “It was a brand-new car that Mary bought”。因此，如果用英語的觀點來看的話，日文中並不存在分裂句，日文上可能形成的分裂句構造是 “メアリーが買ったのは、真新しい車でした”，比較接近所謂的「擬似分裂文」（pseudo-cleft sentence），即 “What Mary bought was a brand-new car” 中文稱為準分裂句。一般日語語法研究，多將 “～のは～だ” 的句式稱為「分裂文」，詳細定義與性質分析可參考砂川（2005）。
22. 然而，以下例句的訊息焦點為處所、時間、目的、情狀的時候，則必須在「的」的後方補上實際的名詞，否則會成為不自然的句子。
 - (1) 李小姐 十年前 在羅馬 學聲樂。
 - (2) 十年前 在羅馬 學聲樂 的（人）是 李小姐。
 - (3) 李小姐 在羅馬 學聲樂 的*（時間）是 十年前。
 - (4) 李小姐 十年前 學聲樂 的*（地點）是 羅馬。
23. 其中一部分包含中文的「準分裂句」，與日文的「分裂文」。
24. 抽取的方法記述如下。中文是抽取出含有「是（SHI）」與「為（VG）」的句子，（SHI）及（VG）為經由 CKIP 的詞性標記，「是」、「為」之前可能出現「就」、「便」、「也」、「常」等副詞。日語則是抽取出「名詞」之後有「だ」、「です」、「で」或是省略掉「だ」的名詞結束的句子。抽出出來的句子需再經過篩選，去處掉非本文所定義的連繫句。
25. 久野（1978）對於句中成份的輕重定義如下：(1) 該成份的字數約多、長度越長則越重，(2) 子句性格越強則越重。本文採取的看法是，句中成份中含述語動詞者較未含動詞者重，含主述語的子句者又比只有述語動詞者重。
26. Wang, Horie, & Pardeshi(2009) 運用小型語料庫檢證了中文與日文的名詞修飾節的差

異，發現在使用頻率上，中文明顯低於日文，而偏好的修飾類型上，中文傾向多用邏輯關係清楚的限定修飾節而日文則是限定修飾節、添加訊息的修飾節、補足性的修飾節的使用沒有明顯限制。

27. 「添加主語」的背後存在著2種顯化的類型，一是由於二種語言的文法系統的差異，源文可以不明示主語，但是譯文若是沒有主語便顯得不自然或不合文法，此為義務的 (obligatory) 顯化，二是添加或不添加都可行的情況，譯者自由選擇的 (optional) 顯化，有一說其來自於 Toury 所說之翻譯行為內含之翻譯規範的影響。
28. 根據圖3，J-ori 以 NG3 為主詞的連繫句有43句，有18句（佔全體的42%）被譯成相同主語，其中10句譯為中文的連繫句，其他8句譯為「是」以外的述語動詞。其他沒有譯成相同主語的句子多數被拆解成更小成份的主語。

參考文獻

- 陸松齡（1995）。**日漢翻譯藝術**。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湯庭池（1980）。國語的分裂句、分裂變句與準分裂句的結構與限制之研究。**師大學報**，25，249-296。
- 蘇琦（1993）。**漢日翻譯教程**。台北：大新書局。
- 戴光榮（2010）。譯文中“源語透過效應”研究——基於語料庫的英譯漢被動句研究。**國際譯聯第六屆「亞洲翻譯家論壇」論文精選集**（頁39-49）。澳門：第六屆亞洲翻譯家論壇。
- 三上章（1960）。**象は鼻が長い**。東京：くろしお出版。
- 久野暉（1978）。**談話の文法**。東京：大修館書店。
- 齊藤泰治（1985）。連体修飾語の処理をめぐって。**中国文学研究**，11，1-16。
- 砂川有里子（2005）。**文法と談話の接点**。東京：くろしお出版。
- 遠藤紹徳、武吉次郎（編）（1990）。**新編・東方中国語講座第4卷【翻訳編】**。東京：東方書店。
- 鄧敏君（2008）。日本語・中国語間の翻訳テキストにおける文長の傾向—双方向パラレルコーパスを用いた翻訳行為の特徴の分析—。**翻訳研究への招待**，2，133-145。
- Baker, M.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M. Baker (Ed.),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 (pp. 231-250). Philadelphia &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aker, M. (1996).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In H. Somers (Ed.), *Terminology, LSP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engineering in honour of Juan C. Sager* (pp. 175-186).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iber, D. (1995). *Dimensions of register variation: A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sterman, A. (2000). What constitutes “progres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B. E. Dimitrova (Ed.), *Översättning och tolkning. Rapport från ASLA: 5 höst-symposium*, Stockholm, 5-6 november 1998. Uppsala: ASLA (pp. 33-49). Retrieved March 1, 2009, from <http://www.helsinki.fi/~chesterman/2000cProgress.html>
- Chesterman, A. (2004a). Beyond the particular. In A. Mauranen & P. Kujamäki (Eds.), *Translation universals: Do they exist?* (pp. 33-49). Philadelphia &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Chesterman, A. (2004b). Contrastive text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universals. In D. Willem, B. Defrancq, T. Coleman, & D. Noël (Eds.), *Contrastive analysis in language: Identifying linguistic units of comparison* (pp. 213-22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hen, H.-H. (1994). The contextual analysis of Chinese sentences with punctuation marks.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9(4), 281-289.
- Ghadessy, M., & Gao, Y. (2001). Small corpora and translation—Comparing thematic organization in two languages. In M. Ghadessy, A. Henry, & R. L. Roseberry (Eds.), *Small corpus studies and ELT* (pp. 335-359).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House, J. (2008). Beyond intervention: Universals in translation? *trans-kom*, 1(1). Retrieved March 1 2009, from http://www.trans-kom.eu/bd01nr01/trans-kom_01-02_House_Beyond_Intervention.20080707.pdf
- Kenny, D. (2000). Lexical hide-and-seek: Looking for creativity in a parallel corpus. In M. Olohan (Ed.),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pp. 93-104).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
- Laviosa, S. (1997). How comparable can ‘comparable corpora’ be? *Target*, 9(2), 289-319.
- Laviosa, S. (1998). Core patterns of lexical use in a comparable corpus of English narrative prose. *Meta*, 43(4), 557-570.
- Mauranen, A., & Kujamäki, P. (Eds.). (2004). *Translation universals: Do they exist?* Philadelphia &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Øverås, L. (1998). In search of the third code: An investigation of norm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eta*, 43(4), 571-588.
- Puurtinen, T. (2003). Nonfinite constructions in Fin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Features of Translationese contradicting translation universals? In S. Granger, J. Lerot, & S. Petch-Tyson (Eds.), *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pp. 141-154). Amsterdam: Rodopi.

- Teich, E. (2003). Cross-linguistic variation in system and text— A Methodology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ranslations and comparable text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Tirkkonen-Condit, S. (2002). Translationese— A myth or an empirical fact? A study into the linguistic identifiability of translated language. *Target*, 14(2), 207-220.
- Thomson, E. A. (2005). Theme unit analysis: A systemic functional treatment of textual meanings in Japanese. *Functions of Language*, 12(2), 157-179.
-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Philadelphia &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Toury, G. (2004). Probabilistic explana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elcome as they are, would they qualify as universals? In A. Mauranen & P. Kujamäki (Eds.), *Translation universal: Do they exist?* (pp. 15-32). Philadelphia &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Tsao, F. F. (1990). *Sentence and clause structure in Chinese: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Taipei: Student Book Company.
- Wang, L. M., Horie K., & Pardeshi, P. (2009). Toward a functional typology of noun modifying constructions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A corpus-based account. In S. Inagaki, M. Hirakawa, S. Arita, Y. Hirakawa, H. Morikawa, & M. Nakayama (Eds.), *Studies in language sciences 8* (pp. 213-228). Tokyo: Kurosio Publishers.